

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的战略思想

□宋士龙 王青松 顾乃武

摘要:宋朝为扭转宋夏战争中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起用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能臣悍将。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始终坚持攻防结合的战略思想,根据不同情况实施防御中有进攻、进攻中有防御的战术。在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思想指导下,范仲淹先后采取修筑城寨、选拔将帅、招降蕃族、改革军制四项措施,为宋夏议和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范仲淹;对夏战争;战略思想

作者简介:宋士龙(1992—),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中国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军事史;王青松(1972—),男,河南信阳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军事史;顾乃武(1971—),男,河北滦县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史。

宋仁宗年间爆发宋夏战争后,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统帅。他在经略陕西的过程中归纳、总结了一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漆侠、李华瑞等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漆侠、钟肇熙等学者对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的研究关注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认为范仲淹在陕西采取一系列防御措施的目的是在防守中积蓄力量,准备大举反攻消灭西夏,但是,他们没有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对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的思想和措施进行提炼,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评价^①;李昌宪、范杰则在范仲淹对夏战争的研究过程中混淆了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及其关系^②;诸葛忆兵、方健等人的研究将范仲淹的战略思想简单概括为积极防御或防御为主^③。综合来看,以上学者的概括还不全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重新分析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措施,以求更真实地还原其在对夏战争中所作的贡献。

在具体分析范仲淹的战略思想之前,有必要先熟悉战略、战术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战略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规律,战略方针、任务、方向和主要作战形式的确定。战术是指指导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主要包括战斗的基本原则、战斗的方法和战斗的组织实施。战略不同于战术,它们之间既有密切关系,又存在明显区别。战略与战术主要体现为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战略是指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途径与手段的总体谋划,而战术则指为达到战略目标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战略与战术是目的与手段的关

系。一般来讲,先有战略,后有战术,战术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略。

在了解了战略战术的含义及其关系后,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所持的战略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探究其为战略进攻或防御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客观评析这一战略的历史作用。

一、进攻中有防御、防御中有进攻的攻防结合的战略思想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战略思想的认识多停留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或混淆了战略和战术的概念及其关系,或简单概括为积极防御或防御为主,陷入非防御即进攻的思维定式,忽略了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事实上,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采取的是防御中有进攻、进攻中有防御的攻防结合的战略思想。

范仲淹在《论夏贼未宜进讨》中曾系统阐述自己的战略:“修城垒,运兵甲,积粮草,移士马,大为攻守全胜之策。”^{[1]713}在《陈乞邠州状》中,范仲淹也曾有所展望:“俟三二年间,边事宁息,攻守有备。”^{[2]446}范仲淹在《再议攻守疏》中又言:“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1]718}由此可见,范仲淹的战略是攻防结合,在防御中有进攻,进攻中也有防御。同时,范仲淹的这一战略又是具体的,他会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战略进攻或防御。综合来看,范仲淹在对夏战争战略上采取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的策略,在战略进攻后仍然主张加强国防。战略防御是范仲淹初到陕西至战略进攻前形成的,他在任陕西都转运使时曾向仁宗建言:“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3]3012}这表明,范仲淹初到陕西是主张防御的,但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在防御中酝酿进攻,在自身实力增强、西夏转弱的情况下即刻转入战略进攻。范仲淹建议仁宗:“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声,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3]3012}范仲淹经略陕西后,在《耀州谢上表》中进一步阐述这种战略进攻:“倘朝廷欲雪边将之耻,当振皇威,大加讨伐,亦系朝廷熟议,必持重缓而图之。”^{[2]394}在经略陕西期间,范仲淹在《阅古堂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平定边陲、追比汉唐的心愿:“敌城一朝拔,戎首万里擒。……复我横山疆,限尔长河浔。……河湟议始行,汉唐功比寻。”^{[2]63}范仲淹离开陕西后,在《与朱校理书》中以未能平定西夏为憾:“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俟其平定,归朝未晚。”^{[1]705}范仲淹在晚年的《遗表》中亦阐述了战略进攻的想法:“誓复横山之壤,亟逼讲和。虽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2]426}综合范仲淹经略陕西前后来看,自始至终都坚持在自身实力增强、西夏转弱的情况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二、实行攻防结合战略的原因分析

范仲淹采取战略防御—战略进攻的攻防结合的战略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实行防御或进攻都有特定的原因。

首先,范仲淹初到陕西实行战略防御与当时的宋朝国力、军备等各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宋朝建国八十余年,国内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范仲淹在《陈八事疏》中指出:“国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近年赦宥既频,赏给复厚,聚于艰难,散于容易,国无远备。……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1]754}正是全国上下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才使李元昊有了可乘之机。宋军连连战败,与军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关系。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曾这样直言宋军士卒:“今诸军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昔之战者,毫然已老;今之壮者,鬻而未战。”^{[2]210}除宋军士卒外,将领的素质也明显下降,范仲淹批评当时的将领道:“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仍闻沿边诸

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掾弭谤,固禄求宠。”^{[2]210}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范仲淹初到陕西时才实行战略防御。

其次,范仲淹在战略防御后转入战略进攻也有原因。在范仲淹经略陕西之前,他曾建议仁宗“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声,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3]3012}。这说明范仲淹在经略陕西之前是主战的,力主“天讨”。但是,范仲淹经营陕西时却主张缓战,希望“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无论缓战还是速战,范仲淹主战是确定的。所以,主战的范仲淹一定会在条件成熟后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而且,范仲淹认为西夏素无信义,反复无常,常为边患,即使暂时议和以后也会叛乱。范仲淹在《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第五状》中强调,“今所切者,昊贼累次盗边,必先伪达诚款,伺我少懈,随即奔冲。今又遣人请和,往复迁延,即过夏月,其或盟约未和,必是又图侵轶”^{[2]444}。西夏不仅时叛时和,还和辽国结为“甥舅之邦”,在两个方向夹困宋朝。范仲淹在《奏陕西河北攻守和备四策》中曾这样形容宋朝的国防形势:“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中国之兵,讨伐未利。而北虏举十万众,谓元昊是甥舅之邦,责中国不当称兵。此交构之际,更何疑哉?”^{[1]586}

综上所述,范仲淹认为只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消灭反复无常的西夏,根除西北边防威胁,才能使宋军避免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集中力量对付辽国。

三、实施战略思想的具体措施

任何一种战略只有能够付诸实践才是可行的,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对于范仲淹这一战略思想,他在之后的奏疏中曾明确论述过其可行性:“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而致不利也。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者,盖太平忘战之弊尔。”^{[3]3353}。这也充分说明宋军屡败的原因为“太平忘战”,并非实力不如西夏,只要善蓄国力、善养兵锋,就一定能平息西北边患。范仲淹为践行这一战略,采取了修筑城寨、选拔将帅、招降蕃族、改革军制四项措施。

(一)修筑城寨,为战略防御做准备

范仲淹为在对夏战争初期做好防御,主张修筑城寨,积极巩固西北边防。在范仲淹任延州知州时就建议仁宗多修城寨,“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3]3111}。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先后修筑了清涧城、承平、永平等寨,“卒城承平等前后十二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3]3082}。范仲淹转任庆州后,继续积极修筑城寨。环庆路有属羌明珠、灭臧等族,他们与李元昊勾结,里应外合,时常为陕西边患。范仲淹修筑古细腰城隔绝李元昊与明珠、灭臧等族的联系,迫使其归降宋朝。范仲淹在陕西主持修筑城寨取得了良好成效,为宋朝初期的战略防御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选拔将帅,精选士卒

为了能够在对夏战争中更好地防御和进攻,范仲淹在陕西积极选拔将帅,精选士卒。范仲淹十分重视将领的选拔和任用,向朝廷阐述将领的重要性,认为“显是军气强弱系于将校”。因此,范仲淹选拔将领不拘门第、不问资历,一切唯才是举。他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中曾言:“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时进擢,庶可用之才,早补将帅之乏。”^{[2]251}在范仲淹经略陕西期间,先后提拔了狄青、王信等一批能征善战的优秀将领。除选拔将帅外,范仲淹还重视士卒的选拔与训练。他主张招募土兵,认为“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土兵在对夏战争中有着较大优势,他们“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无久戍之苦,无数易之弊”。因此,范仲淹建议朝廷多用土兵。他通过选练将帅、精选士卒

等措施,增强了宋军战略防御阶段的防御能力,为战略进攻阶段准备了强有力的进攻力量。

(三)招降番族,以孤敌势

范仲淹为达到削弱西夏的目的,多次招抚番族。庆历元年,知延州的范仲淹在宋朝原有的招抚计划之外亦作了努力,“……况已下敕招携番族首领,臣亦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3]3079}。同时,范仲淹向朝廷提出建议,“(绥、宥)择其要害而据之,屯兵营田,作持久之计。如此,则茶山、横山一带番汉人户,去昊贼相远,惧汉兵威逼,可以招降”^{[3]3079}。在范仲淹转知庆州、管勾环庆路时,“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向导”^{[3]3129}。他先以恩惠笼络番族,“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3]3129},后与其订立法规,“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全族不至,质其首领。’”^{[3]3129}通过约束环庆路各番族,最终实现“诸羌始为汉用”。在范仲淹的建议和实践下,宋朝努力招降沿边各番族,逐步达到了“分彼贼势”、孤立西夏的目的,为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四)在延州设立六将,改革军制

康定元年,范仲淹知延州后积极整军备战,建言献策。起初御敌,朝廷“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铃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3]3036}。范仲淹认为不妥,“不量贼众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3]3036},遂改革军制,将延州兵分别划归六将统领,每将各领三千人分别训练,根据敌军的多少出城御敌。至此,西夏不敢侵犯延州,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3]3036}其他诸路也争相效仿,这也成为日后王安石军制变革中“将兵法”的来源。

通过以上措施,范仲淹稳定了西北局势,积蓄了宋军兵锋,挫败了西夏锐气,为宋朝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四、战略思想实施的结果及其评价

范仲淹依据宋朝和西夏的军事实力制定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的攻防结合的战略,并通过种种措施付诸实践。在范仲淹经略陕西的过程中,这一战略思想基本得到了贯彻,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4]626},宋朝的边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大幅提高。西夏则因连年征战,又与宋朝贸易断绝,国力大不如前,“累年用兵,蕃界劳扰,交锋之下,伤折亦多”^{[3]3348}。范仲淹在此基础上与韩琦“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李元昊听闻后数次向宋廷请和,“遂称臣”。由此可知,这一战略的实施赢得了西北地区的和平局面。

虽然范仲淹这一战略的实施迫使李元昊请和,但却并未得到彻底贯彻,也没有达到预定的战略效果。范仲淹原预定“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3]3012},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一举消灭西夏。但是,仁宗对文臣武将存在普遍的猜忌。范仲淹曾将汉、唐与宋进行对比:“然则汉、唐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3]3013}。由此可知,宋仁宗不将兵、税完全付之于将领,时刻要求将领“俟朝廷之命”。康定元年,晁宗慤等赴永兴军议边事,“上复以手诏问师期,竦等乃画攻守二策……求决于上”^{[3]3060}。不久,仁宗采用攻策,“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3]3062}。枢密副使杜衍反对侥幸出兵,仁宗仍坚持进攻。从仁宗反复催问出师日期、坚持出兵来看,仁宗在心理上猜忌统兵的文臣和武将,害怕他们因统兵日久而出现兵为将有、黄袍加身的情况。正是李元昊的请和、仁宗皇帝对文臣武将的猜忌心理,使仁宗迅速将前线统兵的范仲淹

调离陕西,升任枢密副使,最终导致范仲淹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一举消灭西夏的计划破产。为此,范仲淹曾以西事未宁为由五次上奏请辞枢密副使,希望继续留任西北。范仲淹在《与朱校理书》中忧虑地写道:“人则动远而未济,后有边患,咎归何人?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1]705},尽显担忧与无奈。虽然在范仲淹的战略指导下,宋朝迫使李元昊请和,暂时换取了西北地区的和平局面,但却未能将其贯彻到底,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西夏政权,为以后的西北边疆埋下了隐患。

注释:

- ①漆侠:《范仲淹的历史地位》,《中国历史人物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钟肇熙:《范文正公评传》,《范仲淹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2年;董光涛:《范仲淹戍边绩事考》,《范仲淹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2年。
- ②范杰:《范仲淹的战略文化智慧》,《解放军报》2014年7月19日;李昌宪:《浅攻进驻:范仲淹在北宋对西夏作战中的战略思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 ③诸葛忆兵:《论范仲淹“积极防御”的守边策略》,《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元孙:《评范仲淹御夏策略及措施》,《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高锦花:《论范仲淹的边防思想》,《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魏鸿:《范仲淹边防思想与实践述论》,《军事历史》2016年1月28日;颜丙震:《浅述范仲淹积极防御的备边政策》,《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李从昕:《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战略思想及治军用人方略》,《固原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徐玉金:《试论范仲淹御夏安边军事思想及其实践》,《丝绸之路》2012年;陈荣照:《范仲淹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李涵:《范仲淹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程应闰:《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卢荻:《范仲淹评传》,香港荣誉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参考文献:

- [1]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中)[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 [2]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吴洪泽,尹波.宋人年谱丛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保宏彪)